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潘亚玲

【内容提要】 美国正处于其独立以来国运兴衰的十字路口，它既可能就此进入霸权衰落的长期通道，也可能扭转态势实现霸权重振。为实现再度称霸，维持已延续二百余年的国运上升态势，奥巴马政府已对其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尚不明朗且表现出诸多与奥巴马政府的区别性特征，但其宗旨仍是“让美国再度伟大”。鉴于美国缺乏管理霸权衰落的历史经验，其外交战略调整涉及多个方面，既有管理物质性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也有护持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的理想主义战略，更有预防中国崛起的冒险主义战略。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兼具三个方面，特朗普政府则侧重第一和第三方面。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共同假设是美国物质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对大战略的战略节约、战略集中要求。为应对美国这一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妥善处理由此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中国应推动中美关系保障机制建设，包括短期的危机预警与管理机制，中期的合作关系早期收获计划，长期的中美人文交流、战略互信机制建设，等等。

【关键词】 霸权衰落 外交战略调整 中美关系 保障机制

【作者简介】 潘亚玲，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6-0017-21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6002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美国重建制度能力的战略和政策及我应对方略研究”（2016BGJ003）的中期成果。

面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总统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不确定性，国际社会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战略焦虑”。尽管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体系或需相当长时间才能形成，但考虑到美国决策体系及既有政策的路径依赖，仍可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战略走向作出大致判断。其根本前提是特朗普始终强调的美国可能正在衰落的假设，明确体现在其“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口号中。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新兴大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欧洲面临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讨论似乎逐渐沉寂。但从更为长期的历史视角看，美国延续了二百余年的国运上升态势仍可能趋于终结。或者说，当前的美国正处于国运兴衰的十字路口，既可能就此进入霸权衰落的长期通道，也可能扭转态势重振霸权，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管理霸权的相对衰落。由霸权相对衰落而来的国运逆转的潜在可能，导致美国调整外交战略以阻止甚至扭转这一趋势，其理想状态是再度称霸。这一外交战略调整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全面启动。由于缺乏管理霸权衰落的历史经验，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更多是“全面下注”，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展开：既采用一种战略区间方法的现实主义战略来管理物质性霸权衰落，也通过由制度和规范霸权护持的理想主义战略重振美国霸权，还通过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核心的冒险主义战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通过分析每种战略取向的战略目标、战略机制及政策方法，笔者认为，尽管存在重大差异，但三者的取向都以美国物质霸权相对衰落及由此而来的战略节约、战略集中要求为前提。当然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是“三管齐下”，而后者的重点则在现实主义和冒险主义战略上。考虑到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实现短、中、长期战略的有效组合。

一、现实主义战略：管理霸权衰落

尽管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仍存在激烈争论，但一个明显的事态是，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已经将霸权相对衰落作为其外交战略决策的重要假设或前

提之一。^① 尽管如此，美国本身并无管理霸权衰落的历史经验，世界历史上可供参考的经验也并不多，大体可分为“先发制人”式打击、战略收缩及霸权禅让三种。就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战略环境而言，战略收缩是最为现实和经济的战略选择，再加上美国自身的地理优势，管理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无疑是相当经济的战略选择。

通过战略收缩管理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有着现实可行性。第一，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极大的战略收缩或扩张的自由。回顾历史上霸权的衰落可以发现，几乎所有霸权国家在衰落或陷入虚弱时期，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因为它们往往被多个难以和谐相处的邻国所注视，后者随时准备乘虚而入甚至取而代之。因此，为确保衰落时期的安全而逐步透支日益有限的资源，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导致霸权衰落管理变得极具挑战性且往往难以成功。相比之下，美国自独立以来便无此类担忧，其陆上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军事上都过于弱小，且政治上对美国友好，美国从未真正面临过直接的领土与主权安全威胁；而宽阔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则使美国远离其他大国，拥有令人羡慕的“水域阻截力量”^②。因此，如果美国选择战略收缩以待恢复实力，其挑战者除了持续关注之外并没有太多选择。尽管从独立革命到内战后重建这一时期，美国国力的确难以引起其他国家的重视，但华盛顿总统充分利用美国地理优势而确立的孤立主义战略，确实为其崛起积蓄了重要力量。同时，通过战略收缩以管理霸权衰落并不意味着重回孤立主义，但它却可以获得足够的战略缓冲期。

第二，美国霸权衰落的性质决定了管理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是可行的。一方面，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相对的。与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多轮“美国衰落”争论类似，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一轮关于美国衰落的争论，更多体现为一种“居安思危”的逻辑（尽管这一次似乎更加真实^③）。

^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美国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45-60 页。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p. 114-128.

^③ Gideon Rachman, “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This Time It’s for Real,”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11, pp. 59-63.

如果仅观察美国自身的发展，其国运上升的态势从未发生逆转。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绝对实力始终处于稳步上升之中。例如，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0年冷战结束时的5.75万亿美元（现价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8.7万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相对于其他主要大国，美国的实际增量是最多的。从人均GDP来看，美国在1990年是2.3万美元，2016年增长到5.6万美元，增长了1倍多。^①有学者甚至指出，由于拥有在跨国公司、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优势，美国的国家实力远非GDP所计算的那么简单；美国的国力并没有衰落，“而是全球化了”^②。另一方面，美国的霸权衰落更多局限在经济领域。尽管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下降，但其仍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例如，尽管美国的军费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幅削减，但始终高居全球首位，2016年仍高达6209亿美元。^③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美国的制度霸权和规范霸权仍相当稳固，特别体现在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在所谓“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④

第三，考虑到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霸权衰落的性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针对衰落霸权的制衡联盟很难形成。历史上的霸权衰落往往面临诸多挑战国的联合制衡，但对美国而言，这种情况直到目前仍未出现。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政界、学界普遍担心的硬、软制衡相反，一个新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正日益明显，即美国的潜在挑战国的地区竞争国及其他地区内的中小国家，出于对出现潜在地区霸主的担忧，可能主动为美国提供战略支持，^⑤从而在缺乏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的同时，反而出现了针对美国潜在挑战国的制衡联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July 2017,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Sean Starrs,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 It Globalized: 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4, 2013, pp. 820-825.

^③ *Historical Tables: 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16*, Table 5-1—Budget Authority by Function and Subfunction: 1976-2020, GPO, <https://www.gpo.gov/fdsys/pkg/BUDGET-2016-TAB/pdf/BUDGET-2016-TAB.pdf>; and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pril 2016,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④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第57-58页。

盟。尽管目前尚无法断言其是否是针对中国的制衡联盟，但这一现象在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日益强化的安全与政治联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一针对潜在挑战国的制衡联盟事实上为美国管理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提供了另一种重要战略缓冲。

就战略目标而言，管理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追求一种目标区间方法，其最高目标是在竭力维持霸权的基础上借机再度称霸，最低目标则是尽可能延长美国霸权并实现体面的衰落。这一目标区间方法能够为美国外交带来经济霸权相对衰落时期所需要的战略灵活性、经济性和实用性。一是通过战略区间方法美国可不必顾及外部环境而在战略突进与战略收缩之间灵活选择；二是美国可以根据自身可用战略资源，以最经济的方式进行战略调整；三是美国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追求其战略目标，从而避免因霸权衰落导致可能陷入战略僵局的状况。

就战略机制而言，管理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同时强调国内的战略动员机制和国际的战略成本分摊机制，其根本目标是实现对战略成本的有效管理。一方面，考虑到美国国内对于自身是否衰落、采取何种外交战略等存在重大争议，美国必须实现全方位的国内动员以凝聚国内战略共识，避免由于历史经验缺乏、政治极化等原因而无端浪费资源。这一国内动员机制很大程度上围绕霸权相对衰落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战略决策前提之一来展开，其核心是美国当前在世界上究竟还拥有怎样的领导地位。在 2009 年斯特拉斯堡北约峰会期间，当被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美国例外论”时，奥巴马表示相信，但也声称这与英国相信英国的例外主义或希腊相信希腊的例外主义一样。^①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认为美国应当将“美国例外论”的榜样作用与对美国权势边界的审慎理解相结合，“我们的道德领导地位根本上基于我们的榜样力量，而非将我们的体系强加于其他人民”^②，“将我们（与其余的世界）区分开来的不只是我们的权势，它也必须权势背后的目标”^③。这一战略

^① James Fallows, “Obama on Exceptionalism,” *The Atlantic*, April 4, 2009,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09/04/obama-on-exceptionalism/9874/>.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p. 10.

^③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7,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

共识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例如，2013年，有超过半数（53%）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与十年前相比不再那么重要了，这是自1974年以来的第一次；2016年，这一比例尽管有所回落，但仍有46%。^①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极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2014年，认同这一观点的民众的比例为40%，到2016年则上升为49%。^②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充分虑及经济相对衰落背景下的战略成本分摊，特别是如何鼓励战略盟友为美国排忧解难。具体而言，这一战略成本分摊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维持和巩固现有的盟友与朋友体系；二是建设和完善美国的制度霸权；三是利用其移民社会的优势发展与全世界的关系。

就政策方法而言，霸权衰落管理的现实主义战略强调审慎与务实，即战略实用性。事实上，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的诸多战略举措已经表现出这一特征。例如，奥巴马政府不再使用“全球反恐战争”这一术语，而是用“暴力极端主义”来描述此前小布什政府所强调的“恐怖主义”。又如，在2013年有关叙利亚的演讲中，奥巴马称，“美国并非世界警察，全球正发生很多恐怖事件，纠正所有错误超出我们的能力，但通过适度努力和分析，我们可以阻止儿童免遭毒气致死……我相信我们可以行动。这正是美国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正显示了美国的例外之处。秉持谦虚与决心，使我们永远不会对基本真理丧失关切”^③。

尽管具体措施和手段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事实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实用性。一方面，特朗普承诺要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加强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方面，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的盟友应当承担更多联盟费用。例如，在2017年5月的北约峰会中，特朗普明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军费，认为欧洲盟友没有达到占其GDP总量2%的最低目标。

-union-address.

^① *Public Uncertain, 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5, 2016, p. 59.

^② “Beyond Red vs. Blue: The Political Typology,”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6, 2014,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4/06/26/the-political-typology-beyond-red-vs-blue/>; and *Public Uncertain, 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5, 2016, p. 3.

^③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Syria,”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0,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9/10/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syria>.

二、理想主义战略：寻求霸权重振

尽管面临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但美国的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稳固的。换言之，在美国可用的战略资源趋于紧张的同时，其在制度、规范等方面的竞争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从美国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样，美国的外交战略调整就必须包含另一要素，即从制度、规范霸权的角度，既可以节约战略资源，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尚存的优势，甚至可以实现重振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通过将战线从经济霸权竞争转向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竞争，美国可在无须增加战略投入的情况下实现双重战略目标：一是维持甚至强化自身的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二是为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争取更多的战略缓冲，进而重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理想主义特质，这一取向的战略目标是设法维持甚至拓展美国的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战略机制主要是伙伴关系网络的升级完善，政策方法的重点是外交手段的创新。

考虑到经济优势逐渐消失，美国霸权重振的理想主义战略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具体目标。第一，防御性地维护其在全球政治—安全机制与规范中的引领地位，主要体现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方面。冷战结束后，改革联合国的呼声日渐高涨甚至出现以其他组织替代联合国的讨论。^① 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支持和维护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在全球政治—安全事务上的重要性和权威地位。美国既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授权与联合国授权拥有同等合法性，^② 也反对二十国集团（G20）和国际刑事法庭（ICC）危及安理会的权威地位。即使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只是绕开而非放弃联合国。与此同时，美国还采取多种方式设法拖延甚至阻止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例如，美国对安理会改革的立场事实

^① See 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6.

^② See Abraham D. Sofa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Kosovo,"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6, 2000, p. 1.

上是在分化改革派，克林顿政府支持日本和德国“入常”，而小布什政府只支持日本“入常”，奥巴马政府支持日本和印度“入常”。同时，美国始终将效率放在安理会改革的首位，“我们一贯声称……安理会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使其更加有效。”^① 特朗普执政后决定削减对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资助，尽管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美国将淡化在联合国中的作用，但考虑到美国的特殊重要性，这极可能产生“以退为进”的效果。

第二，进攻性地全面升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考虑到经济复苏和改变全球经济力量对比需要较长时间，同时新兴大国的追赶态势已然形成，美国最经济的重振经济霸权的手段是利用其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更高的相对优势，采取预防性和进攻性举措，设法绕开世界贸易组织（WTO），升级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从而确保其在下一代全球经济规则上的引领地位。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主要体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上，这些举措旨在构建“后 WTO 时代”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这被认为是美国“设定全球规则的最后一次绝佳机会”^②。尽管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通过行政命令宣布退出 TPP，但其选择与各国单独签订贸易协定，进而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奥巴马开启的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谈判。

第三，选择性地抢占全球治理规范的道德高地。不断增生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对各领域全球治理的需求，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困与疾病、互联网、太空、极地和海洋等，事实上可为美国带来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扩张的巨大机会。但出于经济利益、国际政治等考虑，美国对全球治理的不同议题或领域持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换言之，对美国而言，全球治理更多意味着“治理全球”，其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的护持战略也是混合的或可选择的。在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美国的战略是如何实现其主导优势的最大化

^① “On United Nations Reform,” Testimony of R. Nicholas Burns, Under Secretary for Political Affairs,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July 21, 2005, <http://2001-2009.state.gov/p/us/rm/2005/49900.htm>.

^② Michael Czinkota and Valbona Zeneli, “Why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PP,” *The Diplomat*, January 30,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1/why-the-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is-more-important-than-tpp/>.

和长期化，如网络空间治理、海洋和极地治理等；而在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美国首先从抢占道德高地入手，并寻求将其转化为制度霸权和规范霸权，这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气候变化等领域。这种战略的选择性在特朗普执政后表现得更加明显。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6月宣布，美国将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8月4日，美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相关文书。尽管很多评论认为，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重大倒退，但正如特朗普所声称的，只要“美方认定其条款对美国及其贸易、雇员、民众和纳税人更有利”，美国对重回《巴黎协定》持开放态度。而美国国务院声明也指出，尽管可能要退出协定，但美国将继续参加各种国际气候变化磋商和会议。^①

就战略机制而言，霸权重振的理想主义战略着重强调伙伴关系网络的进一步完善。相对经济霸权而言，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更需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来保障。因为，如果美国试图延续其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就必须与新兴大国重新讨论未来美国的地位问题，建构新的“民主的国际主义”（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秩序。^②在这一新的秩序中，美国不再像以往那样“例外”或“不可或缺”，但却是“平等者中的老大”（first among equals）。换言之，未来美国的地位取决于其在诸多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尽管在每个网络中美国未必都拥有同等的核心地位，但在多个网络体系中，美国能确保其具备核心重要性，就像东亚地区的辐辏体系中美国的地位一样。^③为确保这一“平等者中的老大”地位，美国事实上在建构一个同心圆式的三环伙伴关系网络，其核心是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圈是与其他所谓民主的中等强国的伙伴关系，外圈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合作关系。

首先，随着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美国事实上已经开始全面更新其盟友

^① 《美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文书退出〈巴黎协定〉》，新华网，2017年8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8/06/c_129673475.htm。

^②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or a Postexceptionalist Era*, Working Pap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012; and Stewart M. Patrick, “Back to the Future? Ikenberry and Deudney’s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ist*, Council on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6, 2012, <http://blogs.cfr.org/patrick/2012/11/26/back-to-the-future-ikenberry-and-deudneys-democratic-internationalism/>.

^③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p. 300-315.

管理战略，具体表现为，一是“从单线联系到网络治理”，即美国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同时，正有意识地发展多边联盟或建设多边安全机制；二是“从成本分担到责任分担”，即美国正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战略联结点（hub）转移给其盟友经营和管理，通过“对同盟未来发展的信心投下一票”^①的方式赋予盟友更大的政策空间，从而使盟友逐渐成为“安全供应者而非消费者”^②；三是“从联盟到联盟+伙伴”，即在巩固传统联盟并试图实现其多边化的同时，也发展新的盟友，但并不试图采取完全结盟的方式，而是采取如“准联盟”“志同道合联盟”（或“志愿者联盟”）“议题联盟”等形式。

其次，推动民主国家间的权势转移，以此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充分认识到新兴大国并非是一个团结的群体，其内部制度的多样性使其难以实现长期团结。^③要建立民主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就要尽可能团结其“民主国家伙伴”，如果可能，甚至建设“民主国家共同体”。因此，在面对难以阻挡的国际权势转移时，美国试图推动权势从美国向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民主国家转移，以此来阻止权势向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转移。这不仅是由于所谓的“民主和平论”，也由于美国假定民主国家都视美国主导的秩序是友善的，^④而且假定印度、巴西等国崛起所导致的更多是“治理危机”，而不是像中国、俄罗斯崛起所导致的“秩序危机”。^⑤因此，只要美国能找到恰当的方式包容它们，民主国家间的权势转移将能以和平方式实现。

再次，美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外圈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考虑到地区情况差异，美国在拉丁美洲更多针对左派国家实施打压和分化，如特朗普在2017年8月威胁可能对委内瑞拉动武，而在中东地区则以反恐、国家重建

^① Hillary Clinton and Leon Panetta,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at the 48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Bayerischer Hof, Munich, Germany,” *News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4, 2012,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4972>.

^② Ashton Carter, “Remarks by Deputy Secretary Carter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Germany,” *News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 2013,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5186>.

^③ 有关金砖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及其对美国的权势挑战，可参见[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254页。

^④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3, No. 3, 1986, p. 265.

^⑤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 6.

等为重点,在亚太地区以建构针对中国的制衡联盟为核心,只有在非洲强调建立伙伴关系。

就政策方法而言,霸权重振的理想主义战略更强调外交手段创新。这事实上是对美国国内外交手段的创新,或是对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逻辑的改造。首先,地方行为体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数量和频率都在快速增加,而且美国的地方政府正逐渐超越经济活动这一边界。例如,美国地方政府正越来越多地采取制裁手段保护其海外利益。美国马萨诸塞州在1996年就制定了制裁与缅甸有商业往来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的法律。^①到2000年3月,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共通过了37项制裁法案,其中24项针对缅甸,5项针对尼日利亚,4项针对印度尼西亚、北爱尔兰和古巴;另有1部法律针对有血汗工厂的国家,3部法律针对与大屠杀相关的保险公司。^②尽管这些地方性法律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裁定为“违宪”,但很大程度上仍说明外交地方化现象正日渐扩散。随着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地方外交可能再次蓬勃发展。^③

其次,私人行为体在美国外交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安全方面,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美国军事功能的外包上。如表1所示,基于对欧洲权势政治的记忆,美国自建国之初起就有使用合同人员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得以继承和强化,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甚至被称为“第一场私有化的战争”^④。在经济方面,这种发展趋势最明显地体现在新兴的公司外交上,包括从市场层面分析影响价值链的全球市场要素,从政府层面分析政府如何影响价值链,从社会层面分析有组织社会如何影响价值链,以及从信息层面界定市场、政府和社会相联系的全球沟通战略。^⑤在社会方面,美国

^① Terrence Guay, “Local Government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Implications of Massachusetts’ ‘Burma Law,’”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3, 2000, pp. 353-376.

^② *Ibid.*, p. 357.

^③ 有关州和城市在美国气候外交中的作用及其演变,参见潘亚玲:《美国气候外交中的地方参与》,《美国研究》2015年第5期,第74-90页。

^④ Nick Mathiason, “The First Privatised War: Private Contractors are Carving up Defence Procurement,” *The Observer*, March 2, 2003.

^⑤ E. Ordeix-Rigo and J. Duarte, “From Public Diplomacy to Corporate Diplomacy: Increasing Corporation’s Legitimacy and Influ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3, pp. 549-564; and Raymond Saner, Lichia Yiu, and Mikael. Sondergaard, “Business Diplomacy Management: A Core Competency for Global Compan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 14, No. 1, pp.

频繁利用公民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沉默的伙伴”^①进行海外民主推广，主要体现在“颜色革命”或“政权更迭”等活动中。尽管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大力削减针对海外民主推广的资助，但其对“推特外交”的使用，极有可能推动私人行为体参与美国外交这一趋势的发展。

表 1 美国历次战争中的合同人员

冲突	合同人员 (千)	军事人员 (千)	比例
独立战争	2	9	1 : 6
1812 年战争	NA	38	NA
墨西哥战争	6	33	1 : 6
内战	200	1 000	1 : 5
美西战争	NA	35	NA
一战	85	2 000	1 : 24
二战	734	5 400	1 : 7
朝鲜战争	156	393	1 : 2.5
越南战争	70	359	1 : 5
海湾战争	9	500	1 : 55
巴尔干战争 (科索沃)	20	20	1 : 1
阿富汗战争	100	65	1.5 : 1
伊拉克战争	190	200	1 : 1

资料来源: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ontractor’s Support of U.S. Operations in Iraq,” Report for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Pub. No. 3053, August 12, 2008, p. 15; Susanne Schmeidl, “Case Study Afghanistan,” in Ulrike Joras and Adrian Schuster eds.,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and Local Publica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fghanistan and Angola*, Bern: Swisspeace, 2008, pp. 11-12; Moshe Schwartz,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Use of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Background, Analysis, and Option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the Congress, R40835, May 13, 2011, pp. 1, 13。

再次，少数族裔团体在美国外交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即利用其移民

80-92.

^① 苑基荣：《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国内的“减压阀”和外交中的“沉默伙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7日。

社会的独特优势，通过移民促进或阻碍美国与相关族裔来源国的关系。对一些人来说，外交族裔化往往有利于在海外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拥抱美国外交的道德指南”的少数族裔团体可能成为“美国使命的海外推广者”。^① 美国外交的族裔化发展不仅明确体现在犹太裔在美以关系、中东问题上的重要作用，^② 也对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③ 如果说奥巴马因其黑人血统对族裔团体参与外交是一种正面促进的话，那么特朗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放纵则可能从另一个侧面刺激外交族裔化的发展。

美国上述外交手段的创新或可为其霸权重振战略提供更有利的技术手段。若考察 21 世纪头十年美国如何使各国将关注重点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转向软实力竞争，就可理解美国外交创新对其霸权护持的作用。

三、冒险主义战略：管理中国崛起

管理霸权衰落和重振霸权关注的都是美国自身实力不同侧面的战略，都需要长期努力，这不仅意味着短期内难有重大突破，更意味着长期性战略投入。为简化战略复杂性，同时也为了最大程度实现战略集中和战略聚焦，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崛起，试图通过预防性地管理中美元势转移，^④ 遏制美国认为的最大潜在挑战者的“威胁”，从而实现霸权护持目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过度简化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和应对战略，这一战略选择具有很强的冒险主义色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一冒险主义的战略体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迄今仍不明确，但纵观其当选至今不足一年的中美关系起伏，可以认为其冒险性比奥巴马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诸多要素事实上也得到了继承。

就战略目标而言，管理中国崛起的冒险主义战略旨在通过类似“亚太再

^① Yossi Shain, “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100, 25th Anniversary Issue, 1995, pp. 83-84.

^②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参见潘亚玲：《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④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张春：《管理中美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第 74-90 页。

平衡”战略的举措，预防性地管理中美元势转移，通过“以点破面”的方法既实现战略节约和战略集中，又实现短期见效、振奋民心的目标。

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并快速崛起给美国带来两难。一方面，美国所推动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服务于其资本的扩张，还使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受益，为后者提供了进一步融入自由主义秩序的机会，并使其承诺遵循自1945年以来由西方国家所设定的博弈规则。另一方面，美国从最初就担心，崛起的中国将不遵循上述方式融入自由主义秩序，拒绝在美国规则基础上参与博弈，简言之，它可能是体系的破坏者而非支持者。^① 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围绕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展开激烈争论，但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管理中国崛起的迫切性进一步上升。因为，2000年，美国的GDP仍是中国的10倍；2016年，美国的GDP是中国的1倍多，不足2倍。

可以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美国“社会化”中国的战略耐心，尽管在启动冒险主义战略前，奥巴马政府仍就其他战略取向的可能作过试探，包括在上任不到一年就访问中国，提出“两国集团”（G2）倡议等。从2010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到2011年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具体包括调整美军全球部署，在巩固亚太盟友关系的同时拓展伙伴关系网络，以TPP谈判压缩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等等。从单一角度看，这一战略似乎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一旦将其组合起来，其意图就变得相当明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事实上几经调整。最初主要强调从军事上遏制中国崛起，但由于军事遏制过于冒险，也极易引发地区动荡，因此自2012年下半年起，奥巴马政府试图实现对该战略的再平衡，同时关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方面。^② 但从2013年底到2016年总统选举这一阶段，“亚太再平衡”战略事实上呈现动力下降态势。^③ 目前，尽管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尚未成型，但其在美俄关系、南海、台湾地区等问题上的做法，特别是其政策的反复，说明特朗普政府可能在采取一种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 41-72.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 February 2015.

^③ 潘亚玲：《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变化以及中国之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29-34页。

“试错法”寻找最有效的管理中国崛起的方法，其冒险性可想而知。

就战略机制而言，管理中国崛起的冒险主义战略试图建立一个可控的地区对抗机制（无论这一机制是否明确），使中国深陷与周边邻国的纠纷中，或者说设法中断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从而阻止中国的全面崛起，达到管理中美元势转移的目标。与冷战后起伏不断但始终和平的亚太地区战略机制相比，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都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势，如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日、中菲关系，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中印边界对峙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对抗背后，都有明显的美国因素。与奥巴马政府时期亚太地区的对抗主要呈现议题单一、热点单一特征不同，特朗普时期的亚太地区对抗则呈议题多元化、地点联动化态势，形成了对中国外交的整体性挑战。同时，尽管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中印边界对峙久拖不决有重要影响，但美国也的确不时发表缓和言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美国外交的“边缘战略”或冒险主义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创建可控的地区对抗机制的努力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麻烦，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战略格局。但如果超越现实主义甚至更为狭隘的地缘政治视角，从更为理性的全球或地区公共产品供应视角观察，可以发现，亚太地区正浮现一种新的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即中国在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应方面拥有优势，而美国仍主导着对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换言之，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安全互动的介入，同时试图以奥巴马政府的 TPP 或特朗普政府未成体系的经济手段（如 2017 年 8 月中旬启动的对华贸易调查）来压缩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这非但没有起到创建可控的地区对抗机制的目标，反而使亚太地区的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得以凸显。^①事实上，中间国家的反应也证实了这一变化趋势，中间国家大多没有被动接受美国战略东移导致的政策空间压缩而在中美之间“选边”，相反它们更多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敏锐地把握住中美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上正在形成的比较优势结构，通过“两边下注”

^① 有关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的讨论，可参见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52-70页。

(hedge) 的战略，刻意强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美国战略冒险主义的一种“软制衡”，因为美国的根本目标并非固化上述“二元格局”，而是试图全面掌握亚太地区所有公共产品的供应权，唯此才能实现其霸权重振的目标。

就政策方法而言，管理中国崛起的冒险主义战略尽管强调“两面下注”，但更多是从传统的“离岸平衡手”向地区“均势操盘手”的转变，这或许是其最为危险的地方。

但是，美国并非没有意识到“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的冒险性，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久拖未决可能也暗示了这一点。事实上，美国也尝试通过接触来缓解其战略的冒险性，即“两面下注”。美国是国际体系事实上的主导力量，同时，中国正日益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两个事实造成美国管理中国崛起的困境。遏制战略或军事对抗针对的是一个完全处于主导体系之外且明确挑战体系合法性甚至试图推翻它的国家，而不是体系内或至少部分融入体系的国家。遏制会使以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方式来整合中国的大门关闭，因为中美两大经济体系已经高度相互依赖。但接触也存在风险，即中国以一种不再只是通过拓展全球市场的方式崛起，而是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相互紧张关系。为了走出这一困境，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就呈现出明显的“两面下注”特征：一方面，尽管将管理中美元势转移作为战略目标之一，但美国也始终强调欢迎一个繁荣的崛起的中国；^①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或类似的制衡中国的战略时，美国也试图说明该战略并不针对中国，此外美国还试图与中国发展全面的战略对话机制，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和特朗普执政后的四个中美对话机制。换言之，“两面下注”事实上是以实用主义来对冲冒险主义。正如 2010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强调的，“中美间实用主义和有效的关系对于应对 21 世纪的重大挑战具有根本重要性”^②。

^①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Arrival Ceremony,”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5,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9/25/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arrival>.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2010, p. 43.

但美国显然更强调“两面下注”中的强硬对抗甚至遏制的一面，这导致其政策方法中存在尚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险因素，即美国可能从传统的“离岸平衡手”向亚太地区“均势操盘手”转变。应该承认，冷战本身是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场均势较量，同时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亚太地区冷战格局的终结。因此，就亚太地区的均势格局而言，自二战结束以来包括两个层次，即由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组成的“离岸平衡手”和由中朝、日韩组成的“均势操盘手”。但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启动，这一格局正被美国打破。由于其试图推动的可控的地区对抗机制，需要美国一方面继续扮演传统的“离岸平衡手”，搅动亚太地区的安全互动态势，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深度介入以确保地区对抗的可控性。这就是奥巴马在南海问题和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之处：美国一方面声称不插手亚太地区问题，但另一方面却以实际行动唆使日本、菲律宾、越南等挑衅中国，或直接与朝鲜打口水仗；一方面通过各种行动为日本、菲律宾、越南等的挑衅行动提供支持，但另一方面又与中国开展战略性对话，共商中美合作关系。从均势运转的角度看，尽管美国仍力图保持其“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但却不得不持续直接介入亚太地区均势运转，进而存在向“均势操盘手”转变的可能。

美国从传统“离岸平衡手”向亚太地区“均势操盘手”的转变，可能对地区和全球均势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美国、俄罗斯可能同时在地区和全球均势结构中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即既是全球层次的“离岸平衡手”，又是地区层次的“均势操盘手”；另一方面，日本、韩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等国尽管在全球均势中的地位不如中、美、俄，但在地区层次的均势运转中却可能都是“均势操盘手”。考虑到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往往貌合神离，因此在这一双层均势架构中，中、俄在全球均势中相互协调的可能性更大，但在地区层面，中、俄、朝三国的相互协调可能性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尽管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可能无法为美国的全球均势运转贡献太多力量，但可能与美国在地区均势运转中实现更有效的配合。

美国从传统“离岸平衡手”向亚太地区“均势操盘手”的转变，还存在更大的战略性风险。回顾均势发展史，但凡一国放弃其“离岸平衡手”角色，

转而成为“均势操盘手”，其霸权命运很快宣告终结，英国、俄罗斯都是典型。^① 美国是否会步英国或俄罗斯后尘尚不得而知，因为美国向“均势操盘手”的转变极可能只发生在亚太地区而非全球层次。

四、战略不确定期中美关系的保障机制

面对长期性国运转换的可能，美国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调整其外交战略。这一调整既有现实主义要素，也有理想主义要素，还有冒险主义要素（表 2）。如果说奥巴马政府注重三个方面，那么特朗普政府的重心则集中于第一和第三方面。一方面由于美国国运趋势尚不明确，另一方面则由于其他国家与美国的相对权势结构尚不固定，再加上历史经验相对缺乏，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将是长期性的，也可能因时、因势而异，充满不确定性。尽管 2017 年 4 月的“习特会”气氛很好，但从首轮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成效看，仍难以排除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战术对抗”的“新常态”的可能。如何应对战略不确定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多变性和反复性，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前瞻性地思考相关的保障机制建设。

就短期而言，考虑到中美两国的体系重要性，确保中美关系总体稳定、避免出现体系性危机，不仅符合中美双边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因此有效的早期预警和危机管理机制非常重要。由美国战略不确定性导致的中美关系危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即双边和多边。潜在的双边危机主要包括：台湾问题、海空相遇危机、经贸与人文摩擦、意外偶发事件。潜在的多边危机主要包括：美国盟友或朋友诱发的第三方危机，与中美均密切相关的第三方诱发的危机，其他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体系性危机。针对上述潜在危机，中美双方构建早期预警和危机管理机制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中美既有合作的评估，强化对其未来发展的预警能力。二是委托智库、高校研

^① 相关的经典论述可参见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translated by Charles Fullman, London: Alfred A. Knopf, 1962。

究机构或民间力量联合设计覆盖整个中美关系的早期预警指标体系，监测中美关系各领域的现实进展、潜在趋势、相关民意民情变化等，在美国配套建设对中美关系的定期民意调查机制；可在国内设置相应的机构，会同驻美使领馆负责早期预警体系运作，各相关部委、民间团体、在美企业与人员予以配合。三是在早期预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危机预防、处理及长期性解决的能力，其核心是提升中美对预防危机发生及危机发生后避免其升级的能力，这需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而非从短期的政治或经济角度考虑。四是发展针对危机根源的解决机制和能力培养，核心是上游预防能力（upstream prevention）建设，旨在从根源上消除或缓解中美关系中的潜在危机，增进中美社会层面的理解，发展能够抑制中美关系恶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

表 2 国运转换与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取向

	现实主义战略	理想主义战略	冒险主义战略
战略目标	霸权衰落管理： 最高目标：在竭力维持霸权的基础上寻机实现再度称霸 最低目标：尽可能延长美国霸权并实现体面衰落	霸权重振： 防御性地维护其在全球政治安全机制与规范中的引领地位 进攻性地全面升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 选择性地抢占全球治理规范的道德高地	中国崛起管理： “亚太再平衡”战略
战略机制	国内：战略动员机制； 国际：战略成本分摊机制	伙伴关系网络完善： 更新盟友管理战略 推动民主国家间权势转移 建构与发展中国伙伴关系	可控的地区对抗机制： 默许甚至唆使盟友挑衅中国 与中国对话以确保对抗可控
政策方法	审慎与务实	外交手段创新	两面下注 从“离岸平衡手”到地区“均势操盘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就中期而言，关键是如何实现中美合作关系的早期收获，巩固和夯实既

有成就，确保中美关系不反复、不中断、不逆转，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尽管双方仍存在重大认知差距，^① 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进一步优化中美关系的项目设计，建立完整和系统的项目库，包括开工库、预备库和储备库，确保美国政治文化转型^② 和外交战略调整不会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中美关系早期收获的项目库设计包括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依据中美“利益—责任—命运—认知”“四位一体”共同体构建的项目设计。利益共同体方面继续强化中美经贸合作，特别是进一步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继续强化中美地方省州合作；责任共同体方面重点聚焦中美危机管控，如已经发展起来的中美冲突避免与危机管理、公海海域海空军事行动、军事互信措施等；命运共同体方面主要聚焦全球治理议题，特别是以应对埃博拉疫情等为代表的国际卫生合作、伊朗核问题、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阿富汗问题等；认知共同体重点聚焦中美人文交流，在巩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尤其要强化中美青年、妇女、少数民族裔的交流机制建设。第二个向度是依据时间结构确立项目库结构，包括开工库、预备库和储备库三类。二是建立健全中美关系早期收获的系统评估机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核心指标：衡量成果内部各要素平衡与否的成果完整性指标，衡量成果的短、中、长期溢出性影响的成果可持续性指标，衡量成果机制化水平、受中美乃至国际公众欢迎程度的成果弹性指标，衡量成果对第三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影响的成果外溢性指标。三是强化中美关系早期收获的能力建设，重点提高对安全化/去安全化逻辑的灵活运用能力，以促使中美双方在早期收获方面相向而行。

从长期看，中美双方应致力于推进双方的人文交流，培育和提高战略互信水平。中美人文交流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共同构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支柱。下一阶段，应当从两个方向进一步推动

^① 相关评论可参见张新平、杨荣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7 期；胡勇：《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国际展望》2015 年第 2 期，第 35 页。

^② 有关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可参见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美国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44-59 页。

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建设，为战略互信的培育和提升作出新贡献。一方面，需要强化中美人文交流的战略性与前瞻性，例如，中美人文交流应当顺应国际发展潮流，成为推动中美国际体系转型的引领者。另外，应深入理解美国政治生态的中长期变化，预判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动态调整相关交流计划等，其重点是强调中美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双边关系不仅具有双边性，而且具有全球性和体系性。因此，中美人文交流的战略性与前瞻性，不应仅立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更应从全球发展的视角加以思考。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大众化和平民化。例如：应当强化中美人文交流的“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功能，建立中美人文交流的双层次公私伙伴关系，实现功能性转型；应当建设中美人文交流的虚拟社区，实现中美人文交流网络化、社会化、大众化和平民化；还应细化中美人文交流的社会分层政策，充分利用各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组织，使中美人文交流更接地气，广泛深入到最普通的公众中。

与有二百余年历史且仅有上升经验而无衰退管理经验的美国相比，历史悠久的中国有着更为成熟、持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思想。针对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期的不确定性，中国可以大力推进创新性的中美合作关系，积极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一战略选择，有利于将中美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陷入对历史的简单化解读而导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收稿日期：2017-07-29]

[修回日期：2017-09-18]

[责任编辑：石晨霞]